

【文章选编】

B. A. 季什科夫对学术与权力关系的看法¹

译者注：1992年B. A. 季什科夫被任命为俄罗斯联邦民族政策委员会主席，民族事务部部长，1992年10月他辞去该职务。2011年在接受《政治科学》杂志记者O. Ю. 玛丽诺娃采访时，他就学术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做了如下论述。

学者们通常会有这样一种看法，真正的科学研究应该和权力保持一定的距离。这种想法太浪漫，太天真了。可以说，无论是在我国，还是在西方，人文科学从最初产生开始就是处在政权管理之中，在某种程度上是为权力服务的，并且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得到国家的支持。科学知识不受外界任何干扰便能在办公室的宁静氛围中产生，这种想法是不现实的。比如说美国的 political science 这门学科，也是国际上实力强大的学科，毫无疑问，它也是通过各种基金和国家各个部门指定项目的形式与权力联系在一起。“无菌”科学是根本不存在的。现在，我们已经远离了苏联时期严格的监督体制，而这一体制对我们社会科学向更高层次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阻碍作用。我们的问题不在于与权力之间的关系问题，而在于如何研究权力和理解权力。我们的问题还在于，要清楚地知道，与权力机构的对话是必须的，也要努力争取对权力部门产生影响，也包括促进社会变革。如果我们不与权力进行对话，我们就不可能坐在办公室里达到社会变革。1992年我经历了人生中短暂的从政生涯，在政府做民族事务部部长。我并没有辞去研究所所长职务，因为我一直把这段从政经历视为国家发展的复杂时期带给我个人的一段人生插曲。

我曾对叶利钦说过，依靠研究所科研集体的力量，我可以胜任民族事务部部长工作，并且可以为国家民族方针、民族政策的制定提供思路和想法。这并不是说，我想为自己的政治前途赚取资本，过了七个月我就辞去了这一职务。**我离开这个岗位并非因为我出色完成这个工作赋予的使命，而是因为我和一些政客发生了冲突**，其中有叶利钦的副手卡丽娜·斯塔拉沃伊托娃和时任民族局委员会主席的拉马扎·阿布杜拉基波夫。**他们推行民族自决的方针并固执地认为，既然有80个民族，就应该有80个民族领土建制。这种简单幼稚的民族学论断会葬送新生的俄罗斯。正因为我与他们之间在观念上存在严重分歧，迫使我不得不离开这个岗位。**1994年—1996年期间，我的很多思想和观念已经在国家民族政策构想中体现出来，而那时我已经离开了政府部门。并非只有我一人经历过从政生涯，当时有许多学术界人士都参与了政治。现在，政治领域越来越专业化，政治要求一个人要具备特殊的品质。当我任民族事务部部长兼任民研所所长时，在民研所的办公室里可以听到不同的声音，每个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而在部长办公室里只能听到部长一个人的声音。

权力与学术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和工作类型。权力和政治需要毅力坚强的人物，时刻准备着进行严酷的竞争，而从事学术研究的人可以是腼腆的，羞怯的。性格的柔弱并不能阻碍他们的学术创造，也不会妨碍他们达到科学的顶峰，成为令人尊敬的人物。学者探索新的知识，这是一种日复一日的劳动。这种工作需要训练，需要聪慧的头脑及其它一些东西。权力和政治要求人对一个具体事件必须在当下做出决定，不容犹豫不决，而学者可以把工作拖延至明日，可以反复

¹ 这四篇短文摘自B.A.季什科夫著《学术与人生：俄罗斯民族学家访谈录》（臧颖译，丁宏校译，2013年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的附录二、附录六、附录八和附录九。在本《通讯》中把这几篇“附录”介绍给读者，得到了校译者丁宏教授的同意。本文中的黑体字均为本《通讯》编者所加。我们认为本文原译文中的“权利”或许被译为“权力”更符合作者原意，故改为“权力”。

